他山之石

鄂毕高原出土的斯基泰时期马鞍上的角质装饰物

〔俄〕A. П. 波罗多夫斯基[1]　A. H. 杰列金[2]　著
李　冰[3]　译　潘　玲[4]　校
（1. 俄罗斯科学院新西伯利亚分院考古学及民族学研究所，俄罗斯，630090；2. 俄罗斯巴尔瑙尔国立师范大学，俄罗斯，656031；3. 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长春，130012；4.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长春，130012）

一、前　　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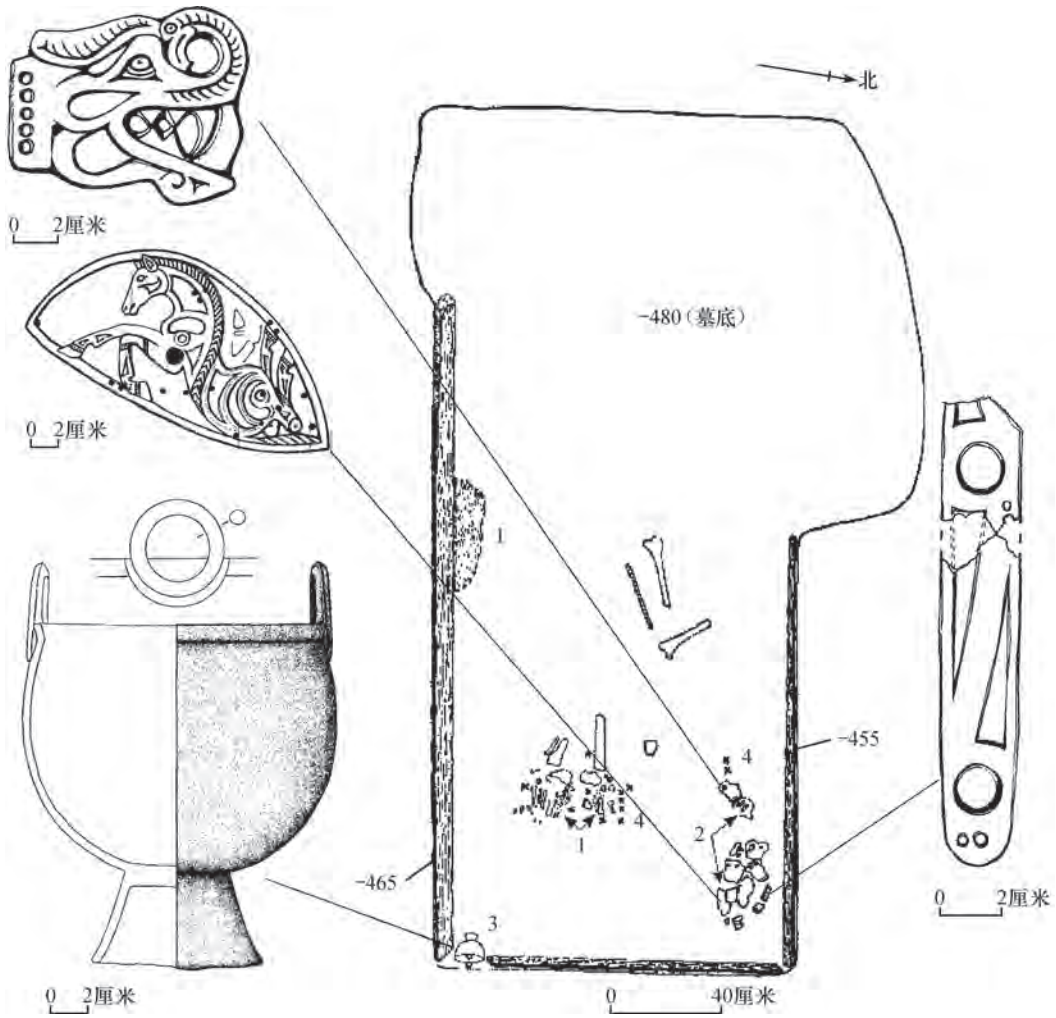
在欧亚大陆角质雕刻艺术的历史中，古代游牧时代是其最繁盛的时期。当时，整个兽角被用作最基本的原材料[1]。人们在以下地方曾经发现过成套的马笼头和挽具上的角质装饰物：巴泽雷克古冢（东阿尔泰）[2]、辰德克-6a（阿尔泰山西南部）[3]、波列里（阿尔泰西南）[4]、西比利亚其赫-1（西北阿尔泰）[5]、马依玛和克拉斯诺依亚尔（北阿尔泰）[6]、诺维萨拉波-2[7]和罗格金哈-1（鄂毕河上游）[8]。单独的马笼头上的角质装饰物见于山地阿尔泰地区（楚鲁图科夫劳格-1、塔拉达-2）、鄂毕河上游（瓦亚金诺-1）以及巴拉巴森林草原地带（穆斯达尔耶卡拉琴-3）[9]的墓葬。2000年，A.H. 杰列金在鄂毕高原的额比耶日德涅一号古冢群（1号冢下的4号墓葬）发现了一套令人惊奇的马具上的角质配件组合（图一）。根据额比耶日德涅一号古冢群1号冢的葬俗和随葬器物特征（陶器、青铜镞、装饰品、武器和马具），可以将其断代为斯基泰时期（公元前5~4世纪）[10]。

图一　额比耶日德涅一号古冢群地理位置示意图

二、器物集合的组成

这些器物发现于额比耶日德涅一号古冢群的1号冢下，位于中部的4号墓葬（被盗过）的东北角（图二）。马挽具的角质部件包括5块马鞍贴片的残片（图三、图四；图版三，1）、5个垂饰（图五；图版三，2），2个皮带上的带穿（图六，1）、1个马肚带上的带扣（图六，2）、1个马前鞍桥上的装饰板（图七，1）。额比耶日德涅一号古冢群出土的马鞍上的弧形小部件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巴泽雷克文化马鞍的部件相同。尖头的角质马肚带扣是该时期富有时代特征的器物（图六，2）[11]。类似的器物也见于以下地点：巴萨达拉-2、图克杰-2[12]、波瑞里[13]、比斯特洛夫克-1[14]。这样的带扣从公元前一千纪中期就开始使用了。在这个冢下的8号墓葬也发现了一件马鞍上的角质贴片（图七，2），该墓葬位于与4号墓葬相对的外圈位置。额比耶日德涅一号古冢群的1号古冢下的4号墓葬内出土的马具角质部件集合共有13片。目前所见数量最多的一组马鞍上的角质雕刻部件出自于巴泽雷克古冢，多达17片[15]。

装饰马鞍桥的、有马图像的贴片尺寸是20.5厘米×9.5厘米×0.6厘米。刻有虚幻动物（格里芬）形象的垂饰扣的尺寸是7.5厘米×5.5厘米×0.8厘米，马肚带扣的尺寸是8.5厘米×6.5厘米×1.5厘米，一对马肚带上的带穿尺寸是6.5厘米×1.9厘米×1厘米。马鞍前桥上的角质贴片残长14厘米，宽2.8厘米，厚0.2~0.3厘米。出自额比耶日德涅一号古冢群马鞍上的所有部件都是用在同一个鹿角的各个部位切下来的角片做成的[16]，用鹿角的枝杈做马鞍的贴片和带扣，用角干做弧形片和带穿。鹿角的不同部位做成不同的半成品并不是随意而为的，因为斯基泰时期的整套马挽具饰片反映出，它们是相当连续的、从一个完整的角上裁切下来的[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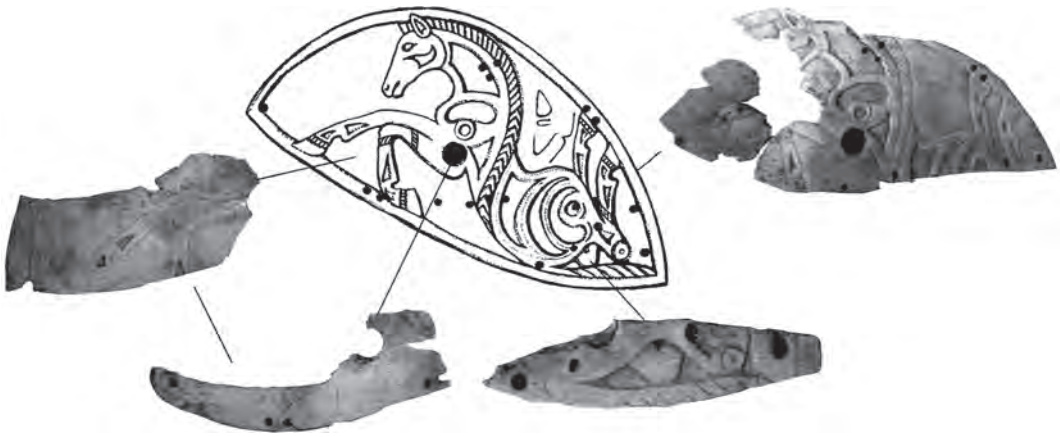


图二 额比耶日德涅一号古冢群1号冢下的4号墓葬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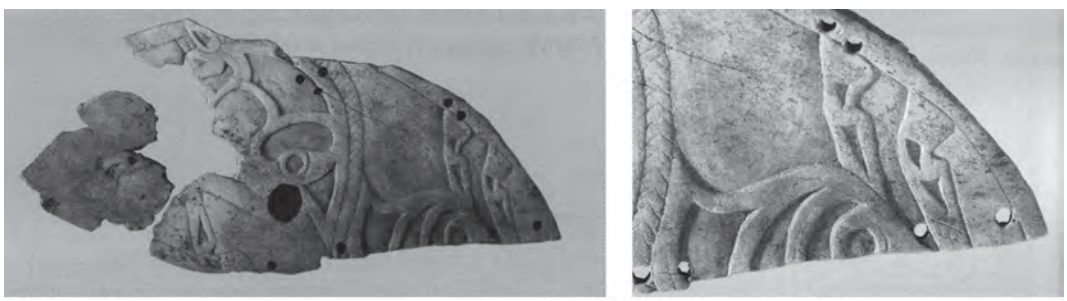
1. 珠子堆 2. 马鞍的角质部件 3. 青铜鍑 4. 金箔残片

额比耶日德涅一号古冢群的马鞍前鞍桥的桥弓部表明，该马鞍属于典型的巴泽雷克文化的带鞍垫的马鞍[18]。在山地阿尔泰以外的鄂毕河上游地区，曾在罗格金哈-1（7号冢的8号墓葬）发现无纹饰的角质鞍的弧形贴片[19]。在山地阿尔泰的巴泽雷克墓葬发现了几个有装饰的角质鞍的贴片（来自波哥金、乌瓦诺夫的个人收藏品以及巴泽雷克3号古冢）[20]。出自额比耶日德涅一号古冢群的鞍的弧形贴片（图七，1）上装饰有打出的小孔和近三角形的刻槽，这种装饰也见于巴泽雷克墓地（3号和4号冢）出土的马鞍的角质部件上，以及琴德科-6a墓地[21]、新疆的斯基泰时期墓葬[22]。

在草原地带很少见的马鞍的角质弧形贴片[23]常见于山地阿尔泰的巴泽雷克贵族冢墓（巴泽雷克3号墓葬，巴泽雷克4号墓葬，施博、卡拉科尔和乌瓦若夫的个人收藏



图三　额比耶日德涅一号古冢群出土的角质马鞍贴片残片及其复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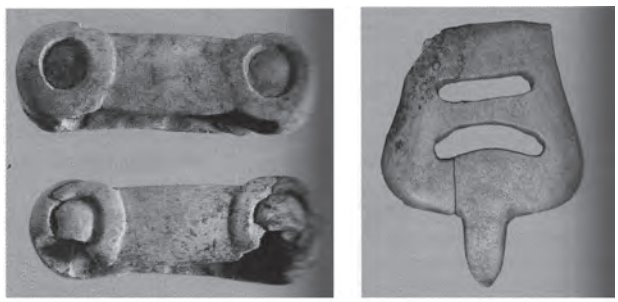


1　　2

图四　额比耶日德涅一号古冢群出土的角质马鞍贴片残片

1. 全图　2. 马腿部特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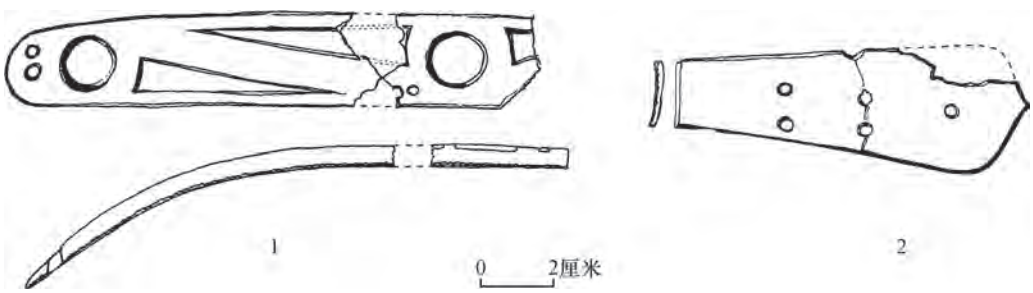
图五　额比耶日德涅一号古冢群出土的刻有象格里芬图案的角质垂饰扣



1 2

图六　额比耶日德涅一号古冢群出土的马肚带的角质部分

1. 带穿　2. 带扣



图七　额比耶日德涅一号古冢群出土的马鞍的角质部分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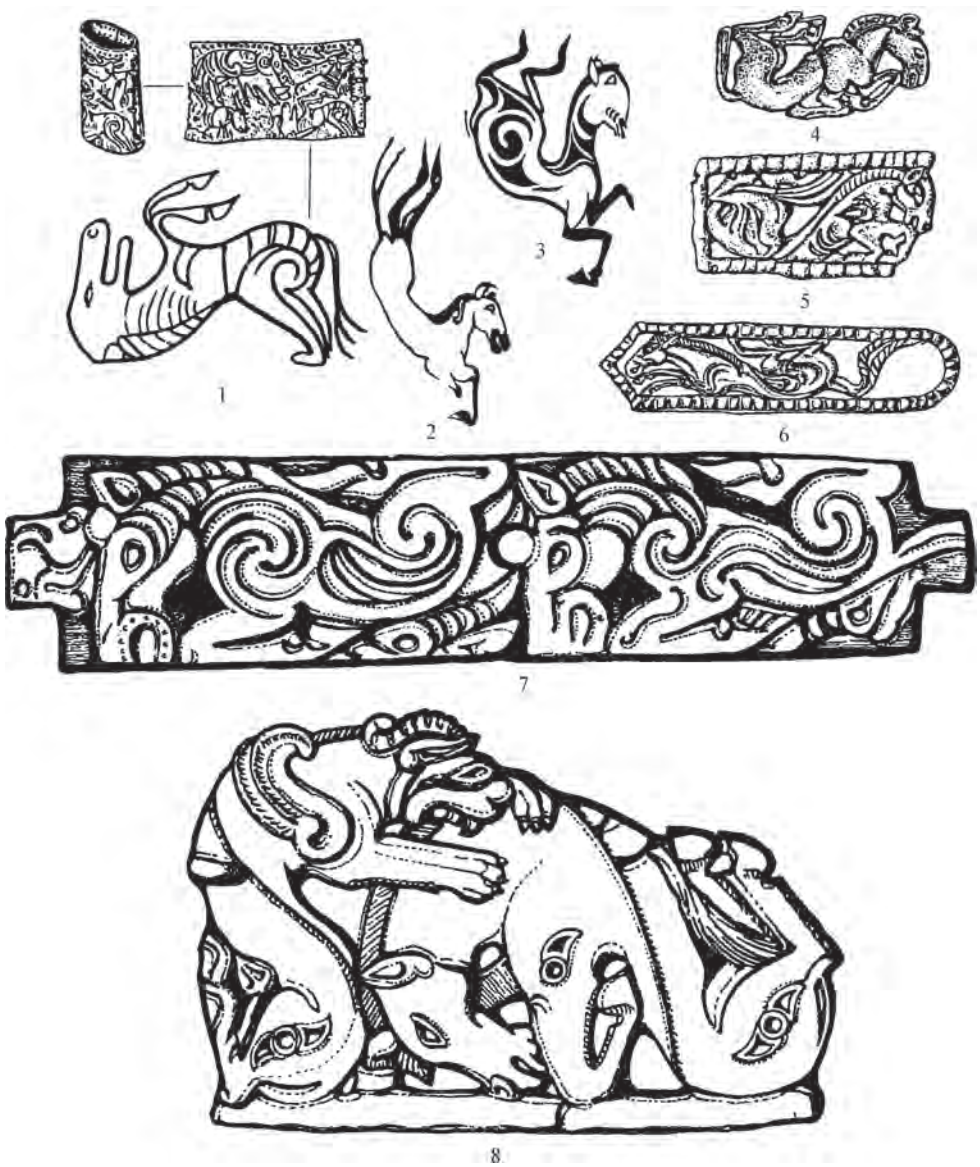
1. 4号墓葬出土的马鞍前鞍板　2. 8号墓葬里出土的鞍板

品）[24]。这些冢墓的直径从18.5米到68米不等。额比耶日德涅一号古冢群1号冢的尺寸（直径30米）符合这些参数。

穿在皮带上的鹿角片（图六，1）上装饰有节突，这使其显得很不同寻常。

三、器物的装饰

马鞍的贴片上有一匹马（图三、图四）和一只象格里芬形象（图五）。有记录表明，从斯达茹尔卡拉茨[25]出土的角质马鞍的饰物上，以及萨格里–巴兹Ⅱ[26]、艾尔米雷格和山地阿尔泰的遗址[27]中出土的角质腰带牌饰上都发现刻有马的图案。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额比耶日德涅一号古冢群发现的马鞍贴片上刻的马形象，其身体是扭曲着的（图三）。这样的图案还出现于彼得大帝西伯利亚收集品的金牌饰（图八，8）、诺沃楚依斯科耶Ⅱ出土的盘子（图八，5）[28]、出土于伊塞克冢墓剑的装饰物（图八，6）[29]、巴泽雷克第5号冢的男性木乃伊右臂的文身（图八，2、3）[30]、艾尔米雷格（图八，1）和萨格里–巴兹Ⅱ（图八，7）出土的角质器物等上面。身体扭曲的动物是公元前5~前4世纪斯基泰–西伯利亚的象征性构图传统的典型图像[31]。个别的细



图八　身体扭曲的马的形象

1. 艾尔米雷格　2、3. 巴泽雷克5号冢　4. 图瓦　5. 诺沃楚依斯科耶Ⅱ　6. 伊塞克　7. 萨格里–巴兹Ⅱ
8. 彼得大帝西伯利亚收集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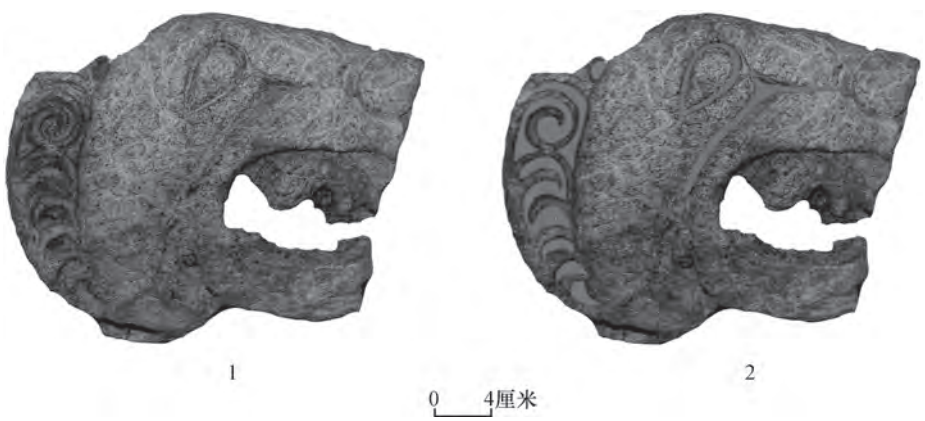
节，例如额比耶日德涅一号古冢群出土的角质马鞍片上的马头（眼睛、耳朵和嘴）和表现身体弯曲度的脊骨上突出的线条[32]即属于这一时期。关于马的身体为什么扭曲，有好几种说法。根据一些专家的观点，它和其他摆出类似姿势的食肉动物是同类的[33, 34]。也有一些人认为这样的图像和古代的祭牲有一定关系[35, 36]。根据乌曼斯克等的说法[37]，如果采用多变的透视绘图法，那么有扭曲身体的马是与此相符合的。事实上，三维绘图是斯基泰–西伯利亚艺术传统的一个突出的特色[38]。鉴于此，又产生了另一种

说法：既然这一传统中孕育着丰富的艺术活力、艺术创造力和观察力，那么这种身体扭曲的马形象很有可能是对马身体刚好在扭曲的那一刻的现实主义反映。在额比耶日德涅一号古冢群出土的用于装饰马前鞍桥的角质贴片上，为了达到三维效果，使用了镜面对称的布局。我们有理由认为，斯基泰–西伯利亚时期的对称构图就是三维形象的平面投影[39]。

额比耶日德涅一号古冢群出土的角质鞍贴片上的马形象与在巴泽雷克巨冢（5号冢）出土的男性木乃伊身上的文身（图八，3），以及该冢出土的马鞍饰物上的麋鹿图案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们与这些鞍的贴片的功能也最接近[40]。额比耶日德涅一号古冢群出土的角质鞍的贴片与图瓦出土的一件青铜牌饰也有相似之处（图八，4）[41]。

在马左前腿的上关节和右后腿的下关节处画脚镯和装饰带，很有可能是东方马挽具的典型特征（图三、图四）。

在马的眼窝、耳朵、颧骨、脖子、肩膀、身体和腿上，人们还能看到红漆的残留碎片（图四）。漆绘是巴泽雷克角质工艺品的典型特征。在巴泽雷克巨冢（5号冢）出土的带有麋鹿图案的马鞍贴片和当卢上，也发现有油漆的残留物[42]。马依玛XIX出土的角质扣上也有残留的油漆（图九）。从额比耶日德涅一号古冢群出土的标本中可以看出，其表面的凹处都填充了油漆（图一〇）。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马臀部的“括弧”形和圆形凹陷。鲁金科认为，巴泽雷克文化的金属小雕像也是用类似的方式装饰的。这也证实了近东对斯基泰–西伯利亚艺术传统有影响的说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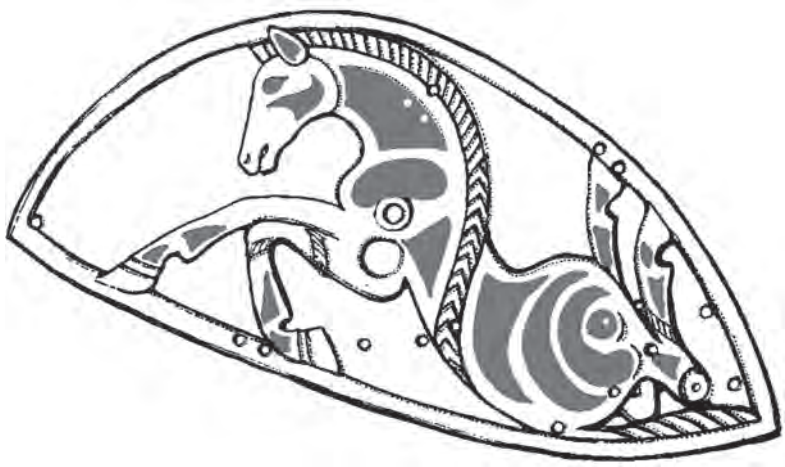


图九　马依玛 XIX 出土的装饰有雪豹头部图案的角质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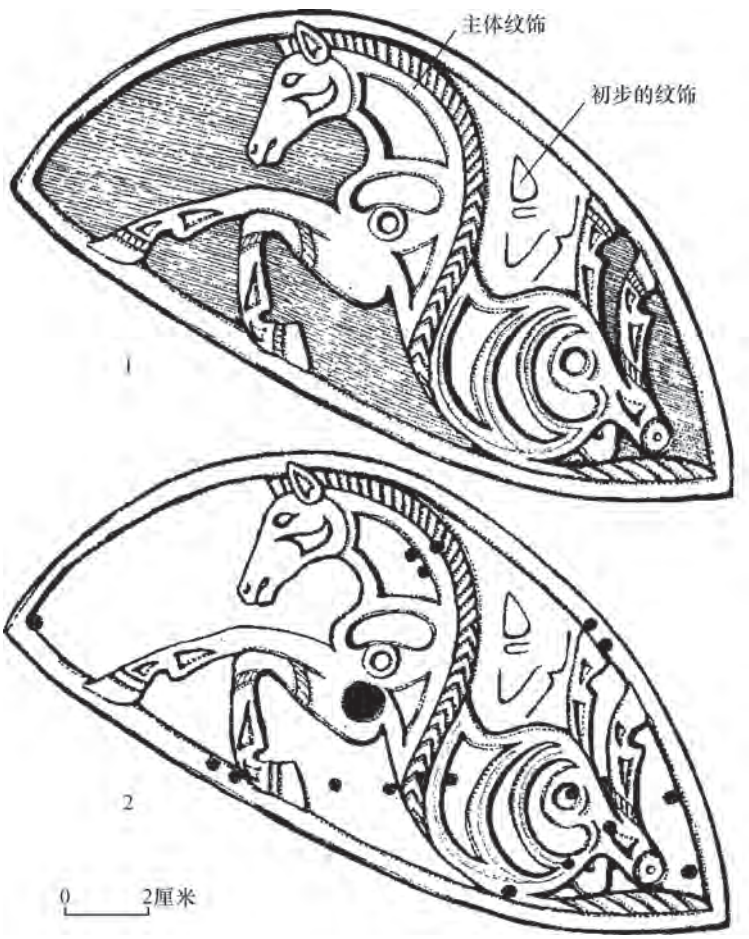
1. 带油漆痕迹的角质扣　2. 油漆图案复原后的角质扣

马腿上的切割线说明，马的图案是分几个不同的阶段雕刻在角质贴片上的（图四，2；图一一，1）。

我们研究的角质片的边缘有小穿孔。根据功能可将其细分为三组（图一一，2）。中间的大穿孔可能和马鞍的结构特征有关系；较小的穿孔是用来把饰物系在马鞍上的。马的臀部和颈部的穿孔是在修补过程中出现的。在一个坠饰扣上也发现有类似的穿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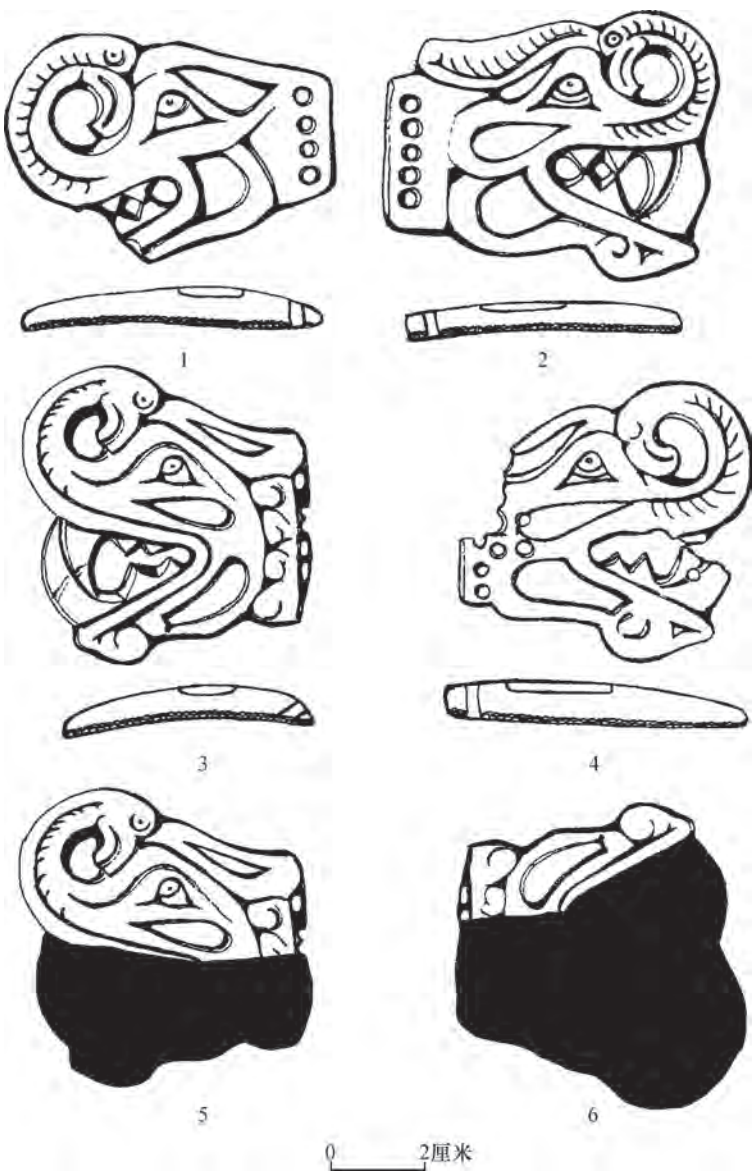
图一〇　额比耶日德涅一号古冢群出土的鞍板上马图像的复原



图一一　操作流程

1. 画一幅画　2. 为了系带和修补而钻孔

（图一二，4）。所有的穿孔都是在马图案被雕刻和涂漆完毕后钻出来的，所以，有些马的轮廓细节部分在这个过程中被切掉了。从波瑞里大墓地36号土冢出土的角质马具碎片上也可以看到类似的特征[43]。为了迎合功能性的需求，斯基泰–西伯利亚艺术传统的“独立性”[44]被故意忽视了。一个华丽的装饰最初被应用在角质片上，可是后来却成了制成的角质片的最终形态。从现代“工业逻辑”的观点来看，这可以被理解为是在“制作物品的最初目的已经改变，或者产品在没有考虑到未来使用价值”的情况下制造出来的。这也违背了手工制品与其装饰之间和谐一致这一斯基泰–西伯利亚艺术的原则[45]。



图一二　额比耶日德涅的坠饰扣上的图案

1~4. 象格里芬　5. 头部回转的鸟　6. 羊头

图一三　科勒尔莫斯出土的仪式用战斧的手柄上的象格里芬形象
（公元前6世纪，库班河流域，D. 舒尔茨发掘）

根据那些因修补目的而钻出的孔来判断，额比耶日德涅一号古冢群的角质马鞍贴片和比斯特洛夫卡-1[46]的青铜镜是采用同一种技术修补的。这一特点表明，我们研究的这些手工制品不仅被使用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它们有可能是从外地传入的。但是，这些事实与普遍认为的“骨质雕刻品是绝对的土著产品”的观点相矛盾。

额比耶日德涅一号古冢群出土的杏仁形角质贴片是巴泽雷克文化的典型器物。这种形状的器物是用多种有机材料制成的：角、木头、毛毡[47]以及皮革。额比耶日德涅一号古冢群出土的贴片上，马身上涂有油漆的浮雕状装饰与用皮革和毛毡做成的贴花装饰有异曲同工之妙。

额比耶日德涅一号古冢群出土的角质坠饰扣上装饰的虚幻动物形象十分特别（图一二）。 这可能是一只象格里芬，这一形象在斯基泰艺术品中偶尔出现。在科勒尔莫斯的仪式用器物中，战斧的手柄上也出现过这种形象（图一三；图版二，4）[48]。象格里芬头部的轮廓与猛禽的类似，这也是非洲象的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49]。因此，额比耶日德涅一号古冢群出土的坠饰上的象鼻末端采用了猛禽头部形状的做法也就并非偶然之举了。与科勒尔莫斯的带象鼻的格里芬相比，额比耶日德涅一号古冢群的象格里芬形象看起来更“可怕”。它的牙又大又尖，具有猫科动物的典型特征。上文提到的出自马依玛XIX（阿尔泰山北部）的角质扣上的雪豹也画成牙上带条纹的样子（图九）。这个角质扣很有可能是马笼头或挽具上的饰物。

如上所述，出土于额比耶日德涅一号古冢群的象格里芬形象中包含有一只头部回转的鸟。这样的形象在早期铁器时代较为常见。鸟的颈部和神兽的鼻子重合（图一二，5）。在西伯利亚，早在青铜时代（乌斯季伊里尔墓地）的骨质雕刻器物上就出现头部回转的鸟形象[50]。在早期铁器时代，装饰着这种鸟形象的器物见于塔加尔文化的收藏品，也见于鄂毕河上游地区（额尔迪恩斯科耶-1）[51]、鄂尔多斯[52]以及山地阿尔泰地区（巴泽雷克巨冢中的5号冢）[53]。弗尔希科娃[54]认为，在巴泽雷克巨冢中的5号冢出土的当卢上的食肉动物捕捉两只水禽的图案也是三维图画的一种平面投影。额比耶日德涅一号古冢群出土的马鞍带上的角质坠饰扣是对称的，那么它们可能也是三维思想的体现，与马鞍饰物上身体扭曲的马是同一道理。

象格里芬形象的下颌末端呈公羊头的形状（图一二，6），这可能反映的是欧亚大陆游牧民族对“farn”（ 财富的象征 ）的态度[55]。这种形象也被画在南西伯利亚的

斯基泰时期的马具部件上[56, 57]。公羊头的形象与公元前4世纪伊朗北部青铜手镯末端的动物形象的造型风格非常相似[58]。表现虚幻动物角的方法与斯基泰–西伯利亚艺术传统相吻合，斯基泰早期（公元前7~前6世纪）刻在角质马笼头装饰物上的“公羊格里芬”形象反映了这一传统（科勒尔莫斯、特米尔–果拉、如洛夫卡）[59]。公羊格里芬的形象与在科勒尔莫斯发现的仪式用战斧上的象格里芬属于同一时期。

额比耶日德涅一号古冢群出土的“象格里芬”形象可能暗指骑兵和战象之间的冲突（这样的情节最早出现在希腊文化时期）。象的使用的确是希腊时期（公元前334~前323年）早期最重要的创举。马其顿的军队在波斯的高加梅拉战役中（公元前331年）首次遭遇参战的象群。5年之后，即公元前326年，有大象参战（200头）的最大战役在旁遮普的赫达斯庇河拉开序幕。马其顿军队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使用印度战象。直到布匿战争（公元前264~前146年）之后，人们才开始放弃使用战象[60]。在那个历史时期，象的形象出现在建筑物的细部[61]， 罗马的钱币上[62]，以及用于装饰马具的银质圆牌上（图一四，1、3）[63]。

在斯基泰时期，住在鄂毕河流域上游的部落对于象这种异域动物有了间接的了解，因为许多手工艺品上都有象的图像，例如彼得大帝的西伯利亚收藏品中的银质希腊–巴克特里亚圆牌（图一四，3），以及若格兹辛-1出土的青铜镜[64]。

图一四　早期铁器时代大象的图像

1. 在英吉利海峡的萨克岛发现的银质圆牌　2. 罗格金哈-1（鄂毕河上游地区）出土的镜子上的雕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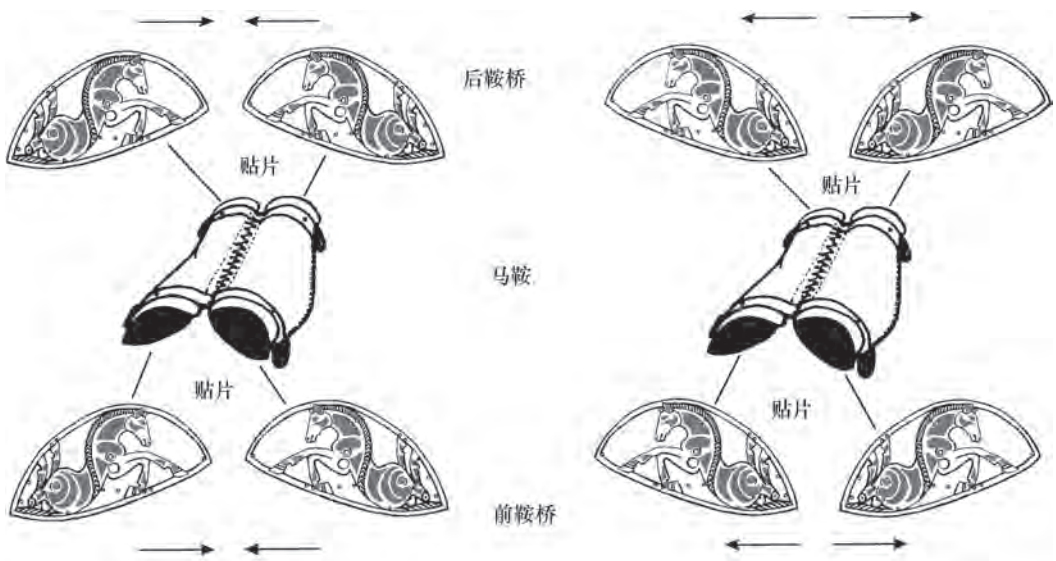
3. 彼得大帝的西伯利亚（西西伯利亚）收藏品中的银质圆牌

值得注意的是从比斯特洛夫卡-1、罗格金哈-1、洛克塔-4a以及巴泽雷克出土的一系列青铜镜可能来源于印度[65~67]。我们认为，额比耶日德涅一号古冢群出土的带扣上的象格里芬图像是解读整套物品的关键所在。罗格金哈镜子上所刻的象头也有同样的作用（图一四，2）[68]。在印度，大象甚至被描绘成一种神话中的动物，还是潜水天才[69]。这些都赋予了它超自然的能力，大象已不再是普通的动物。因此，游牧部落的人可能试图通过用大象的图像来装饰马具这一形式，将大象的力量和马的力量结

合在一起。

根据成套器物的组成以及单件器物的装饰，我们做出如下复原（图一五）：刻画有面部相对的两匹马形象的角片固定在前、后马鞍桥上（图一五，1）。角质部件的双对称组合是巴泽雷克马具的典型特征（巴泽雷克巨冢的2号和5号冢，弗若洛夫个人收藏品）[70]。马鞍贴片的布置还有另外一种模式，即角质贴片按照马形象相互背对的布局固定在鞍上（图一五，2）。这种布局见于巴萨达尔2号墓以及巴泽雷克巨冢的5号冢出土的器物上。这种布局与斯基泰时期纹章的布局相一致[71]。额比耶日德涅一号古冢群4号土冢下的8号墓葬出土的长角质片很有可能是固定在带垫马鞍的尾鞘皮带上的。类似的器物还见于艾尔米雷格（图瓦地区）和交河（新疆）的斯基泰时期墓葬。

С. И. 鲁金科在解释早期铁器时代的带垫马鞍的功能性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这些带垫马鞍在大草原地区比山区更为常见[72]。“在临近山地阿尔泰的地区不使用带角质贴片的马鞍”的论断[73]是没有考古依据的。这样的马鞍曾见于距离阿尔泰山北麓更北面的鄂毕高原，这证明这种马具在斯基泰时期分布于平原地区。



图一五　额比耶日德涅一号古冢群出土鞍饰板的布局变化

四、结　　语

额比耶日德涅出土的马鞍的角质部件与巴泽雷克和萨迦的野兽风装饰相似。很难说这种相似是巧合，因为鄂毕高原正是连接哈萨克斯坦大草原和阿尔泰山的中间地带。

额比耶日德涅一号古冢群的土冢似乎和哈萨克斯坦的萨迦人有关系。这些萨迦人

在公元前第一千纪的中期迁徙到鄂毕河上游地区，并且在陶器、礼器、装饰品、武器和马具上留下了他们的痕迹[74]。因此，额比耶日德涅一号古冢群出土的马鞍贴片上的马形象与伊塞克以及诺沃楚依斯科耶Ⅱ（图八，5、6）出土武器上的野兽风装饰相类似也就十分合理了。

将额比耶日德涅一号古冢群出土的随葬器物组合与迁徙到鄂毕河上游的萨迦人[75]联系起来，是对这类遗存的最合理的解释之一。位于哈萨克斯坦和山地阿尔泰的早期铁器时代骨器制造中心与鄂毕高原有着密切的联系[76]。额比耶日德涅一号古冢群发现的角质饰物很有可能是这种联系的结果。这些器物将斯基泰–西伯利亚艺术的东、西方图像与近东的艺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额比耶日德涅一号古冢群出土的马鞍饰片上的大量图像（象格里芬、头部回转的鸟、公羊-farn）与图瓦和哈萨克斯坦特有的角质雕刻品——“拼图板”相类似。出土于鄂毕河上游、阿尔泰以及图瓦的斯基泰时期的各种此类角质工艺品[77]在中央亚洲地区都可找到实际的相似物[78，79]。

额比耶日德涅出土的角质马鞍贴片的着色与在巴泽雷克、波瑞里、马依玛所见的巴泽雷克装饰传统相一致。从公元前5~前4世纪，山地阿尔泰的骨器制造中心对平原地区有相当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力可以从罗格金哈[80~82]、诺沃沙拉巴-2、瓦特金诺、额比耶日德涅一号古冢群出土的各种角质器物中反映出来。

在额比耶日德涅一号古冢群的马具装饰物上出现象格里芬的形象，这除了与神话有关联外，也与亚历山大大帝在踏上征服全世界的旅程之后，人们认识到“象可被用于战场”有一定关系。如果的确如此，那么额比耶日德涅一号古冢群出土的马鞍饰板就是希腊化时代这种军事变革的早期现实反映。如果额比耶日德涅一号古冢群出土的艺术品组合确实与公元前一千纪下半叶移居到鄂毕河流域上游的萨迦人有关系，那么这种解释是站得住脚的，因为萨迦人直接参与了亚历山大大帝时期的战争[83]。除此之外，在公元前5世纪和公元前4世纪，曾经有规模不大的游牧群体从南乌拉尔以及北哈萨克斯坦迁移到鄂毕河上游以及库隆达，考古资料对此有明显的反映[84]。

额比耶日德涅一号古冢群1号冢下的4号墓葬出土的角质装饰品组合，是迄今为止山地阿尔泰地区以外的草原地带此类器物的最完整组合之一。值得注意的是，马并没有和马具一起随葬。这种马具装饰品出现在西西伯利亚南部平原地带未必应该解释为“早期游牧时代特有的、用真马随葬的习俗”。斯基泰时期的鄂毕河上游地区的草原和森林草原地带的居民驯养大量马匹，因此用马随葬未必象征死者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因为一套带有较高品位装饰物的马具完全能起到同样的作用。

上述角质装饰品出自于额比耶日德涅一号古冢群包含多座墓葬的古冢下的中心墓葬，大概是公元前一千纪下半叶的南西伯利亚平原地区贵族的随葬品，这一贵族可能是萨迦人或者其后裔。在游牧社会的传统中，马鞍不仅是马具中的实用部分，而且是声望和价值的象征。有华丽装饰物的斯基泰时期的马具完全符合这一标准。正因如此，不仅

在山地阿尔泰的波瑞里和巴泽雷克的冢墓中随葬这种马具，它们也见于西西伯利亚南部的集合有多座墓葬的古冢下的中心墓葬中（罗格金哈一号墓地7号冢下的8号墓葬、诺沃萨拉巴二号墓地2号冢、额比耶日德涅一号古冢群1号冢下的4号墓葬）。

注：本文译自《欧亚大陆的考古学、民族学和人类学》2007年第2期，第52～62页（根据该杂志的英文版和俄文版对照翻译）。

注　释

［1］ A. P. 波罗多夫斯基. 西西伯利亚南部斯基泰时期的有艺术美感的骨制品加工中心［A］.阿尔泰及邻近地区的斯基泰时期研究成果［C］. 巴尔瑙尔：阿尔泰国立大学出版社，1999（b）：23—26.

［2］ S. I. 鲁金科. 斯基泰时期山地阿尔泰居民的文化［M］. 莫斯科、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53：150—160.

［3］ Z. S. 萨马舍夫，A. P. 波罗多夫斯基. 波瑞里大墓地出土的马笼头和挽具上的角质装饰物［J］.欧亚大陆的考古学、民族学和人类学，2004（3）：82—87.

［4］ 同注［3］.

［5］ A. P.波罗多夫斯基. 公元前一千纪上半叶马身上的装备（根据阿尔泰西北部的发掘资料）［A］. 苏联亚洲部分的石器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C］. 新西伯利亚：科学出版社，1988：73—80.

［6］ S. M. 舍尔戈耶夫. 阿尔泰“斯基泰”古冢出土的马笼头上的雕刻装饰物［J］.苏联考古学，1946（8）：289—293.

［7］ T. I. 德罗依茨卡娅，A. I. 波罗多夫斯基. 鄂毕河附近森林草原的大河文化［M］. 新西伯利亚科学出版社，1994：93、155.

［8］ A. P. 乌曼斯基，A. B. 萨姆辛，P. I. 苏里格. 鄂毕河左岸的罗格金哈1号斯基泰时期墓地［M］. 巴尔瑙尔：阿尔泰国立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40—141.

［9］ A. P. 波罗多夫斯基，G. I. 格利亚米娜. 巴拉巴森林草原的萨迦的角质雕刻品［A］. 西伯利亚及邻近地区的考古学、民族学和人类学：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学和民族学研究所年终会议材料（第7卷）［C］. 新西伯利亚：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学和民族学研究所，2001：271—276.

［10］ A. I. 杰列金，A. N. 波罗多夫斯基. 鄂毕河附近高原出土的斯基泰时期马鞍上的角质装饰物［A］. 西伯利亚及邻近地区的考古学、民族学和人类学问题（第9卷第一部分）［C］. 新西伯利亚：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学和民族学研究所，2005：470—475.

［11］ S. I. 奇里耶夫，P. I. 苏里格. 乌伊莫恩斯克谷地发现的一套马具［A］. 南西伯利亚人民的历史文化遗存研究［C］. 戈尔诺阿尔泰斯克阿克–切切克出版社，2006：93.

［12］ S. I. 鲁金科. 斯基泰时期中央阿尔泰居民的文化［M］. 莫斯科、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出版

社，1960：68、70、124.

［13］ Z. S. 萨马舍夫，G. A. 巴扎尔巴耶娃，G. S. 朱曼波寇娃. 赫洛得的“金色怪兽”和阿尔泰地区的哈萨克游牧民的古代文化（德文）［J］.欧亚古物，2002（8）：237—276.

［14］ A. P. 波罗多夫斯基. 一个斯基泰–西伯利亚艺术多重划纹集合的三维空间［A］.考古学复原方法的方法论［C］. 新西伯利亚：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学和民族学研究所，1994：83，图15.

［15］ 同注［2］.

［16］ A. P. 波罗多夫斯基. 西西伯利亚南部的古代骨制品（公元前一千纪下半叶至公元一千纪上半叶）［M］.新西伯利亚：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学和民族学研究所，1997：212，图5，1.

［17］ A. P. 波罗多夫斯基. 西西伯利亚的角质马具和装饰品［A］.古代的西西伯利亚和南西伯利亚［C］.巴尔瑙尔：阿尔泰国立大学出版社，2005：58、59.

［18］ 同注［12］，227、228.

［19］ 同注［8］，141，图20，1—3.

［20］ 同注［2］.

［21］ 同注［11］，105，图5.

［22］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交河故城：1993~1994年度考古发掘报告［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54.

［23］ 同注［8］，47.

［24］ 同注［2］.

［25］ 同注［9］.

［26］ A. D. 格拉齐. 中央亚洲的古代游牧民族［M］. 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0：178、179, 图40、41.

［27］ A. D. 波罗多夫斯基. 对萨格里–巴兹-2出土马身上的角质雕刻板的新分析［J］.西伯利亚人文科学，1999（a）3：90、91.

［28］ V. A. 莫格里尼科夫. 公元前一千纪中叶至下半叶鄂毕河上游附近的居民［M］.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1997：171，图41-5.

［29］ K. A. 阿基舍夫. 伊塞克古冢［M］.莫斯科：艺术出版社，1978：106，图25.

［30］ L. L. 巴尔寇娃，S. V. 班寇娃. 巴泽雷克巨冢出土木乃伊上的文身（新资料）［J］.欧亚大陆的考古学、民族学和人类学，2005（2）：52，图五，6.

［31］ L. D. 巴尔寇娃. 阿尔泰早期游牧人艺术中的食草动物和食肉动物形象的分期和地域差别（艺术风格分析的尝试）［J］.艾尔米塔日国立博物馆考古文集，1995（32）：76.

［32］ A. I. 杰列金. 额比耶日德涅1号墓地古冢群的发掘，2004年考古发现［M］.莫斯科科学出版社，2005：72、74.

［33］ 同注［12］，300、301.

［34］ L. L. 巴尔寇娃. 巴萨达尔斯克古冢2号石椁发现的各种动物形象［J］.艾尔米塔日国立博物馆考古文集，1984（25）：86.

［35］ I. L. 卢莎科娃. 关于早期游牧民族的神话意识问题［A］.南西伯利亚考古学［C］. 新西伯利亚：科学出版社，2003：96—99.

［36］ O. S. 索维多娃. 叶尼塞的塔加尔时期的岩画（题材和图像）［M］. 新西伯利亚：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学和人类学研究所出版，2005：43、45.

［37］ 同注［8］，65.

［38］ 同注［14］.

［39］ E. L. 弗尔希科娃. 匈奴–萨尔玛特时期金属板的对称结构［A］.中央亚洲的古代文化和圣彼得堡［C］.圣彼得堡：文化信息出版社，1998：179.

［40］ 同注［2］，图128.

［41］ E. F. 科洛里科娃欧亚大陆的野兽风：斯基泰时期伏尔加下游和南部部落的艺术［M］. 圣彼得堡：彼得堡东方分院，2006：187.

［42］ 同注［2］，180，图150-a.

［43］ 同注［3］.

［44］ L. A. 费多若夫-达维多夫. 游牧民族的艺术和金帐汗国［M］. 莫斯科：艺术出版社，1976：15—54.

［45］ 同注［32］，24、34.

［46］ 同注［7］，165.

［47］ N. V. 波罗西马克，L. L. 巴尔寇娃. 阿尔泰巴泽雷克人的骨制品和纺织品（公元前5至前3世纪）［M］. 新西伯利亚：因弗里出版社，2005：125—127.

［48］ 依斯库斯托夫.斯基泰艺术（英文）［M］. 列宁格勒：依斯库斯托夫出版社，1986：40.

［49］ V. A. 奇瑟里. 斯基泰古冢出土的古代东方珠宝杰作［M］. 圣彼得堡：彼得堡东方分院，2003：43.

［50］ T. A. 阿波度洛夫，M. V. 德鲁里斯，S. A. 得尤巴斯. 乌斯季–依里尔斯基墓地（年代和文化性质问题）［A］. 叶尼塞河临近地区的考古学、历史学、方志学和民族学问题 （第2卷）［C］.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国立大学出版社，1992：108.

［51］ 同注［16］，171.

［52］ E. C. 邦克. 欧亚大陆东部大草原的古代青铜器（英文）［M］. 圣莫妮卡，1996：46，图A45.

［53］ 同注［2］，180，图150-a.

［54］ 同注［39］.

［55］ A. P. 波罗多夫斯基. 西伯利亚斯基泰时期的法尔林和角质形象的特性［J］. 欧亚大陆的考古学、民族学和人类学，2004（4）：135—140.

［56］ 同注［32］，138、139.

［57］ 同注［47］，127.

［58］ P. K. 波尔茨. 东方的装饰品［M］. 巴黎，1999：23.

［59］ 同注［48］，23、24、26、27、36.

［60］ P. 科恩诺里. 古希腊和古罗马：战争史百科全书［M］. 莫斯科：埃克斯姆出版社，2001.

［61］ G. 绍尔特，R. 温宁. 文化的融合：佩特拉城–德卡波里斯（德文）［A］.东方文化历史：来自约旦的一万年的艺术与文化［C］. 柏林，波恩，2005：112—114.

［62］ 同注［60］.

［63］ M. B. 苏金. 银质法拉里：是“希腊–巴克托利风格”还是“马里布”风格？［A］.跨越世纪的欧亚大陆［C］. 圣彼得堡：圣彼得堡大学出版社，2001：74、75.

［64］ 同注［8］，32、175，图54.

［65］ Ya. V. 瓦西里科夫. 南西伯利亚古冢的印度多玛乌里斯克艺术：与若格金哈一号墓地出土铜镜题材的同一性［A］.欧亚大陆地带：语音和文字［C］. 莫斯科，2000：77—86.

［66］ Ya. V. 瓦西里科夫. 阿尔泰斯基泰的印度神话：若格金哈一号墓地（公元前五世纪）出土铜镜上的图像的语义学解释［A］. 维克多·马克西莫维奇·日尔门斯基院士诞辰110周年代表会议材料［C］.圣彼得堡：科学出版社，2001：335—345.

［67］ 同注［8］，32、175，图54.

［68］ 同注［66］，337.

［69］ 同注［32］，338.

［70］ 同注［39］，179、180.

［71］ 同注［31］，67，图2—8.

［72］ 同注［12］，227、228.

［73］ 同注［8］，48.

［74］ 同注［28］，103、108.

［75］ 同注［10］，475.

［76］ 同注［1］.

［77］ K. V. 楚古诺夫. 公元前一千纪中叶图瓦的地域考古学特性［A］.跨越世纪的欧亚大陆［C］. 圣彼得堡：圣彼得堡大学出版社，2001：174.

［78］ A. P. 波罗多夫斯基. 萨迦的有野兽风题材雕刻的带具所反映的文化历史联系［J］.西伯利亚的人文科学，1995（3）：58、59.

［79］ 同注［1］，25、26.

［80］ A. P. 乌曼斯基. 关于早期铁器时代阿尔泰山地和森林草原地带部落的相关影响问题［A］.山地阿尔泰的历史问题［C］. 巴尔瑙尔：巴尔瑙尔国立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35—54.

［81］ A. P. 乌曼斯基. 巴尔瑙尔师范大学1985年发掘的若格金辛斯基古冢［A］.阿尔泰和西西伯利亚铁器时代的考古学问题［C］. 巴尔瑙尔：巴尔瑙尔国立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51—59.

［82］　同注［28］，104.

［83］　V. A.甘波夫，G.A.科瑟勒恩克. 亚历山大·马其顿时期的中亚游牧民族（文献历史资料）［J］.古代史通讯，2005（1）：118.

［84］　同注［28］，104.

Horn Saddle Ornaments Dating to the Scythian Period from the Ob Plateau

A. P. Borodovsky　A. N. Telegin

Translated by Li Bing　Proofread by Pan Ling

In 2000, a set of horn harness was unearthed in burial 4, in the middle of mound 1, Obiezdnoye-1, in the Upper Ob region of Siberia, Russia. The saddle plates with horse image and the pendants of elephant griffin in them are very important. The horse's twisted body on the saddle plates and the shape of the plates are both dated from Pazyryk culture. Elephant griffin is the combination of two kinds of monsters of Scythian and India. These animal images are possibly brought there by the Saka who moved to Upper Ob region in the middle of the 1st millennium BC, dating to the 5th—4th cent. BC.